

點，並重點以之分析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在這一基礎上，作者採用民族志的形式，雖然探討的是族群與國家之關係這一大視野下的論題，但她從六堆地區的具體人物入手，為讀者展現了在國家政權的變遷中，六堆地方人士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這也使得讀者更易生出同情之心。這一特點也可以在作者所運用的史料中表現出來，除縣志和日治時期的檔案、公文等官方史料以外，作者也大量引用報刊、帳簿、嘗簿和族譜等民間史料。二是作者雖然以六堆地區為研究主體，但眼光又不囿於六堆地區，作者常將六堆地區與臺灣北部桃竹苗以及中國東南地區的客家社會進行比較，既突出了六堆地區在客家族群認同構建中的獨特性，又說明了六堆客家納入臺灣乃至中國整體客家認同的過程。

以上兩個特點固然是本書在客家研究領域的突破，但筆者對此亦有兩點建議：一是作者引用了大量與六堆地方社會精英有關的材料，可以看出六堆地方精英在構建六堆地方與國家認同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但群體中精英階層的認同並不能作為整個族群自覺認同之代表，且這些精英多是與外界接觸較多的商人或政客，外來的刺激更易催生出族群認同。筆者認為，在田野調查中更多地了解不同階層與身份的六堆人士對自身「客家」身份的認同程度，對於本書主題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二是六堆地區的族群認同，無論是清朝的「粵人」，還是之後的「客家」，都與其內部在遷臺之前就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心理和習俗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若能對其遷臺前的歷史和催生其族群認同的文化基礎進行闡述，會使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顯得更加清晰、更具有連續性。

張琪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曼素恩著，羅曉翔譯，《張門才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282頁。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國常州延續傳承着這樣一門士紳家庭才媛生活：本家族內的男子多游離於官宦、教書與行醫之間，也為生計從事於商業。但就是這戶普通的士紳家庭，先後培養出三代才女。《張門才女》不僅全面記錄了其這個時期的時局的觀點和看法，更對其家族男女們的文學造詣進行了

全面展現。三代才女的著作非常顯著地影響了當時的性別看法，極大提升了當時女性的社會地位。在《張門才女》中，作者曼素恩(Susan Mann)以時間為軸，對三代才女的人生經歷進行審視和描述。

引子部份為第一章。1894年春，河道總督許振禕作序的《讀選樓初稿》刊印出版，張家才女故事第三代人物，也就是詩集的作者王採蘋剛於此前去世。同年，大清艦隊在甲午海戰中慘敗於日本，次年簽訂的《馬關條約》宣佈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此後，帝國精英開始對傳統價值觀與制度進行痛苦反思。通過引子的倒敘，曼素恩帶我們走進張家三代才媛。

本書第一部份講述的是張門第一代才女湯瑤卿的人生事蹟。湯瑤卿出身名門，自祖父及姑母的教育下學習詩詞創作，27歲與張家次子張琦完婚。張琦的科舉非常不順利，在湯瑤卿嫁入張家之後，張琦只能四處遊歷發展事業，妻兒留守家中，由湯瑤卿獨自操持家務，照顧並教導子女。由於沉重的家庭壓力全部由湯瑤卿一人承擔，清貧困苦的生活影響了湯瑤卿對文學的追求與實踐。張琦50歲才高中舉人，60歲出任山東鄒平知縣，湯瑤卿才攜家人與張琦團聚。在完成湯瑤卿生平的敘述後，文章重點對其持家方略進行評價分析，對女性的財務管理理念進行集中論述，同時對其嫁妝、刺繡進行探討分析。

第二部份則以湯瑤卿與張琦所誕下的四個女兒為主人公。在四姐妹中，長女張縉英取得了最高的文學成就，成婚後她長期居住於娘家，同母親、妹妹一起研究詩詞歌賦，直至40歲時才同其夫吳贊遷往京師。在京師的生活中，張縉英積極參與各類社交活動，極大擴寬了自身的文學視野，並對當時朝廷的腐敗無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社會現實也讓她明白了女性的可悲地位，在當時的社會中女性想展露才情何等困難，這種憂憤在其文學作品中時有體現；次女在出嫁之後忙於適應新生活、操持家務，因此沒有閒暇進行文學創作，並且在生下第二個孩子之後就因病去世，留下詩稿被家人收集整理；三女張綸英自小天資聰穎，癡迷於書畫作品，其書法摒棄了當時女性所普遍使用的小楷，代之以陽剛、雄渾的魏碑體。張綸英的書法造詣逐漸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前來訪問求字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受到了朝鮮書法收藏家的關注和拜訪，使得張綸英的知名度拓展到了海外；小女張紉英則是張氏姐妹中最為幸運的，因為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因此她很少從事家事，讀書學習的時間最多，其夫王曦是以入贅的形式進入張家，因此張紉英能夠安心地在娘家醉心於詩詞藝術。在幼弟張曜孫的主持操辦下，張氏姐妹的詩集先後刊印出版，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研究。在該章節中，大女張縉英繼承了湯瑤卿對詩作的熱愛之心，而姐妹兄弟的婚姻關係也成為評價分析的重點內

容。以張家生活狀況為對象，作者對常州婦女的婚姻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分析。在結婚之後，張氏姐妹仍然與娘家保持了親密的關係，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在張氏四姐妹中，兩個女兒是通過招贅的形式依然生活在娘家，另一個女兒則因丈夫長期任職於外地而居住在娘家，只有一個女兒真正遠嫁到其他地方與夫家一起生活。

第三部份的主人公是張紉英的長女王採蘋。她生長生活於清道光到咸豐年間，除擅長詩詞書畫與女紅之外，還對當時介紹西方國家的書籍和資料產生了廣泛的興趣愛好，並在張縉英的影響和指導下，通過詩詞作品對當時的時局進行點評和議論，從而展現女性對社會的關注和重視。王採蘋在25歲時遠嫁河南，其夫早逝，未能生育子嗣。出於生存的需要，王採蘋只能自食其力，在李鴻章、許振偉等高官望族家中擔任女塾師。在許振偉的努力之下，王採蘋的《讀選樓詩稿》得以刊印，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學財富。1893年，在清帝國面臨衰亡的末年，王採蘋因病逝世。

本書的敘述中，從母教看張家女子教育和創作氛圍、女性在家中的主導地位、入贅式婚姻以及家族中男性幫助下的文獻整理保存都是中國晚晴才媛家庭中值得探討的點。

母教在本書中最大的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家庭母親、姨母等長輩對子女的教育；二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揣摩、對比和學習；三是女兒在羨慕、觀察、模仿家中長輩女性的基礎上嘗試進行超越和進一步發展。張琦夫人湯瑤卿在教育張門四女一子上起了重大作用。不僅個個成才，而且又把這一教育傳統傳給了下一代。她的四個女兒在詩詞領域建樹頗豐，獲得了「毗陵四才女」的美譽。湯瑤卿自幼熟讀四書五經，奠定了扎實的文學基礎，自小就表現出詩詞創作方面的天賦，留下眾多詩詞作品。但是在傳統家庭教育理念的影響下，在湯的母家，她是不被鼓勵作詩的。可喜的是她到了夫家後作品漸豐。張家不僅是對女性提供家學教育，還鼓勵女性文學創作。這種家庭氛圍是孕育張門三代才女的基礎。第二代主人公，即湯瑤卿長女張縉英，她自幼就表現出過人的詩詞天賦。在其家庭教育中，自小先於姐妹兄弟一起念書學習，12歲起就由湯瑤卿進行教育，不斷汲取文學知識。在其長兄去世之後，因湯瑤卿需操持家務無暇教書，她就只能自己閱讀鑽研父親書房內的藏書，廣泛涉獵各類詩詞歌賦，奠定了良好的文學基礎。除湯瑤卿的教育之外，張琦作為父親也十分開明，非常重視女兒的教育，一有閒暇時間就親自教導女兒讀書學習，積極推動了女兒們的成長。此外，最重要的是，張家姐妹之間一起對詩和讀書，在家務勞動的過程中一同專研推敲詩句和其韻律。第三代

主人公女塾師王採蘋如同家族中其他女性一般，王採蘋也表現出過人的詩詞天賦，自幼便傾心於讀書學習與詩詞創作。少時和母親張執英、姨母張綸英同住，和前一代女性一樣接受家中母教。遷居京師之後，王採蘋同姨媽張縉英長期接觸，並在其影響下將其對時局的關心和了解表現於其詩詞作品中。綜上所述，母教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將發揮重要作用，每個女性的成長情況與教育水準將直接決定子女的起點，因此，女性正是在一代代人的不斷積累中不斷發展成長。

本書非常強調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作者以女性的視角對明清時期中國精英階層的家族生活進行深入的微觀考察，展現了中國家族史中更為廣闊和鮮為人知的歷史圖景。這對現有的家族史研究，尤其是以男性為敘述核心的家族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中國家族史研究。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家庭中男性的責任是通過科舉走上仕途，而家庭子女教育承上啟下的重大責任往往落在主婦肩上。這在清代尤甚。這是由於清代的兩項政策：做官一般不得在原籍，科考則又必須回原籍。這樣丈夫科舉後常常千里迢迢到外地做官，無論是否隨行，主婦都成了家庭教育的關鍵人物。如果是留守，主婦的責任更重大。江南推崇文重科舉，很多大家族在選媳婦時特別注重品德和才學。這就是更高一個層次上的「門當戶對」。湯瑤卿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在張家，男人常年在外奔波，女人留守家中照顧家庭。在取得科舉功名和官職之前，張家男性常年在外漂泊，並在業儒、治學、著述、從教、行醫之間靈活地轉換。於湯瑤卿而言，在丈夫離家遠行的十多年中，她不僅承擔了養育子女照顧家庭的重擔，還肩負起了教育五個子女的責任。這些現象反映出在19世紀江南士紳文化中，維持社會地位、踐行階層規範，需要在外漂泊的男人們和留守家中恪守婦德教育子女的女人們的共同努力和付出。

在第二部份針對張門第二代才女沒有遠嫁、隨父居的婚後生活，曼素恩認為，入贅這一婚姻形式在常州地區並不是張家的獨特個案，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形象。這種婚嫁形式與當時國內的其他地區表現出顯著差異，而不是傳統觀點認為的中國婦女一旦婚嫁之後就與娘家脫離關係。她指出，明清時期的中國婦女在婚嫁問題上表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張氏才女的文字對當時婦女的生活狀態和社會關係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記錄和描述，因此為當時常州婦女社會地位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資料。但是書中將這類婚姻定義為入贅婚，顯然是不對的。入贅婚姻，即指男女結婚後，男到女家成親落戶的情形，這種婚姻多是女家無兄無弟，為了傳宗接代者招女婿上門。男到

女家成親落戶要隨女家的姓氏。在《張門才女》一書中，顯然王曦和張紉英夫婦、張綸英和孫頡夫婦的後代還是隨父姓的。事實上，張氏的家族史與父系傳宗接代之法則並不矛盾。它只表明了中國家庭體系的靈活性與複雜性。

從家族文獻的整理與保存上看，張琦的兒子張曜孫替姐妹收集和刊刻詩集、鼓勵外甥女們寫詩，這是張家三代才女詩作能夠保存和流傳的最重要原因。這一傳統直至王採蘋遠嫁之後仍然得到保留，他也將收集與刊印家中詩詞作品作為一項使命和安慰。這一行為極大感動了張家女性，就連王採蘋也因舅舅的行為而深受感動，她從中得到了足夠的安慰。

本書的獨樹一幟和成功，最重要的應歸功於作者「情境化」的書寫方式和獨特的女性視角，通過現代學術研究較少使用的寫作方式進行創作，並在章節故事完結之後對其中的內容進行注釋和點評。曼素恩指出，這種創作方法是一種向司馬遷致敬的方式。但是她所創造的寫作方式與內容結構則要比司馬遷撰寫的《史記》更加複雜。雖然文章的主體內容是對家庭生活事務的描述，表現為一種家庭小說式的寫法內容，但是其獨特的贊評內容卻充份體現了作者對社會現象觀察分析的透徹性與個人研究能力。注釋部份也讓本書的敘述有了可依靠的史料證據。曼素恩在本書開端的序言中明確指出：「本書所涉及的内容一定程度上與正史中所記載的張家家族歷史有所差異，不符合傳統中國文化對正史的定義，屬於一種近乎於外史或者野史的内容。」在大量原始史料的基礎上，如女性的詩文集、地方志以及相關的回憶文章等，作者大膽地融入了史學家的猜想和虛構，運用「情境化」寫作方式，重構常州張氏家族三代女性——湯瑤卿、張縉英、王採蘋的家庭生活、社交網路、人生經歷甚至情感生活。所以，該著作的價值不僅體現於能夠充份表明主人公所處年代的史料事實，同時也展示了作者嚴謹廣泛的考證與整理，能夠集中將與作品内容有關的詩詞作品穿插於作品中；基於原始史料和時代背景構擬出歷史情境的寫作方式，使歷史人物成為場景和敘述的核心，並打破了一般學術著作的枯燥艱澀，具有極強的代入感。同時，每一章節獨創的贊評內容，也充份體現了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及所持的觀點認知，因此賦予作品獨特的文學與藝術價值。但是，這類敘述式寫作需要出於文學創作的考慮，書中還存在虛構的一些場景與結果。這種獨特的寫作模式需要作者在史料整理外，還需文學創作方面的能力與整體把握能力。

林靜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